

中国现代文学史丛书

中国现代小说史

编 著 者

主编 田仲济 孙昌熙

执笔 韩立群 蒋心焕

王长水 韩之友

山东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济南

中国现代文学丛书

中国现代小说史

田仲济 孙昌熙主编

※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18.5印张 5 插页 414千字

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书号 10331·48 精装定价 3.95 元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反映着时代脉搏的知识分子形象	1
一 封建制度的叛逆者、牺牲者和维护者	2
二 革命时代的彷徨者和觉醒者	54
三 艰难岁月中的铸炼者	94
第二章 解放途中的妇女形象	115
一 解放的开端	115
二 在社会革命的激流里	145
三 翻身解放前后	177
第三章 在斗争中成长的工人形象	205
一 神圣的劳工	206
二 斗争的先锋	217
三 革命的主人	243
第四章 从昏睡到觉醒的农民形象	260
一 被侮辱、被损害的老一代农民	261
二 在艰难的道路上挣扎觉醒的一代农民	288
三 自觉解放的新一代农民	333
第五章 具有前驱者和领导者姿态的革命党人形象	364
一 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党人	364
二 五四以后的无政府主义党人	374
三 共产党人	385

第六章	改造和变化中的市民形象	410
一	小城镇中具有精神弱点的小人物	410
二	在社会变动中升沉和变化着的市民知识分子	425
三	在民族压迫和民族斗争中觉醒和改造的市民形象	416
第七章	嵌着时代记印的历史小说中的人物形象	455
一	带着时代精神的折光	455
二	映着现实斗争的剑影	468
三	嵌着民族矛盾和民族斗争的印痕	495
第八章	其他人物形象	509
一	军官与士兵	509
二	地主与资本家	524
三	官僚和政客	542
附录	中国现代小说发展概貌	547
后记	580

序 言

自五四新文学运动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是三十年的时间。就历史的长河而说，三十年不过是短暂的瞬间，但新文学运动以来的三十年，可说是极为不平凡的三十年。这三十年的开端是轰轰烈烈的，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的五四运动。一九二五年发生了震动全世界的南京路五卅惨案，接着爆发港九等反帝的工人运动，一直迎接了革命军的北伐；四·一二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叛变革命，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大屠杀，也是古今中外的史书上罕见的；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以至热河抗战，八·一三的民族反侵略的战争的全面展开；是整个民族生死的斗争。最后是三年的解放战争，肃清了大陆上的残雾，才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民，开了一个新的纪元。

建国后新出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或《中国新文学史》的分期办法大半沿用了《新民主主义论》的分期办法，如今这类文学史出版的已二十来种了。但专史在国内尚缺如。

一九七九年我们四校合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完毕后，有几位同志提出编写一本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倡议，出版社认为有这个需要，几位同志兴趣也很大，于是就商量怎样动手了。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分期法，现在各种现代文学史可说全是按政治分期分为五个或四个时期的。政治情势的发展变

化未必完全同文艺的发展变化相同，而最不方便的问题是将仅仅三十年分为四或五个阶段来叙述，势必将许多人的作品分割为五段或四段来分析。当然，有的作家可以设专章或专节，但总的说来，专章既不可能设得太多，就整本书来说，也带来了一种不太协调的意味。

遇到的第二个问题是怎样来写呢？以小说作者的风格流派来分呢？以作者所属的社团或出现的先后顺序来分呢？还是以创造的人物形象来分呢？我们商讨的结果，采取了最后的方式，理由很简单。我们这短暂的三十年就政治社会说，是变化剧烈的三十年，就人民群众说是从昏睡到觉醒的三十年。变化最大的是工农大众，他（她）们是由奴隶变为主人，压迫他（她）们的三座大山完全被推倒了。这期间最苦的自然还是妇女，她们更多着一层夫权的压迫，处在社会的最底层。那些被卖被迫，出卖肉体为妓为娼的更不待提了。五四时期，提出了男女平等、女子解放、劳工神圣等口号，但事实上远远没有实现。在劳动奴隶得到解放以前，任何个人的解放都是空言。

在过去的年代里，百分之九十的土地在地主老财手中的年代里，我们常读到“丰收乐”的诗词和图画。事实上，在那些年代里，“乐”的不会象诗词中或画家的笔端写的农民的全家老小，而是文人画家想象的情景，无论丰收或歉收，“乐”的都是地主老财，“乐”是很难轮到农民身上的。在旧时代的文学，鲁迅称为“瞒”和“骗”的文学，从事件的反映，从人物的刻画，的确是这样，是完全或基本上歪曲了现实，颠倒了现实的，所以鲁迅不喜欢历代帝王的御用文人所编撰的正史，而是注意于向野史、笔记中去探索历史的真面貌，他常说，《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才真正地反映出了满清入关后的德

政。

握在封建文士手中的笔，在“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孔孟之道的教育下，是绝不会为女子与小人说公道话的。毛泽东同志讲辛亥革命赶跑了一个皇帝，鲁迅曾讲辛亥革命剪掉了一条辫子，这都是说它并未完成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但小的改变不能不说从辛亥革命以至五四运动是逐渐地开展了。静修庵中那皇帝万岁龙牌不是辛亥革命时期被假洋鬼子等砸毁的么？接着到了五四运动，“至圣先师”不是变成“孔老二”而且有人高喊要“打倒孔家店”么？就在那个时候，蔡元培在天安门前讲演，提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而“男女平等”，妇女解放，个性解放等等口号，也是在那时提出的。当然，许多口号提出了，具体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得到彻底解决还有待于以后，以后劳动人民的得到解放。但事物是天天地发展，社会是在逐渐地进步，尽管其间难免有曲折迂回，是应该承认的，更应该承认；事物的发展是由量变到质变，并不是突然发生的。

在短暂的三十年中我们中国社会是发生了这么多的变化，虽然是仅仅是人生“一代”的岁月，但其间人的生活、思想以至整个社会的面貌变化是剧烈的，至少在一定范围内变化是剧烈的。

“文学是人学”，特别是小说，主要的是要真实地反映出时代的面貌，是要写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因此，我们这部三院校四位同志合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以人物形象来分章的，例如知识分子形象在五四时期有孔乙己、丁举人、高尔础、四铭、涓生、子君等，到第二个十年，也就是左翼十年期间，又有了很大的改变，《二月》中的肖涧秋是彷徨、追求中的人物，《动摇》、《幻灭》、《追求》的一些男女青

年，一度走上革命的征途，但在革命受到挫折中，他们悲观、苦闷、消极退却了。自然，革命的火种是不会熄灭的，那些最坚定的人，是跌倒后又站了起来，擦掉自己身上的血迹，掩埋了伙伴的尸体，又继续前进。这是人类的希望，带动时代车轮前进的先锋。自然同时还存在着倪焕之甚而陈庄长要与他断绝父子关系的陈葵元一流人物，后者是时代的泥沙，是任何时代，任何人群难免出现这样情况的。在第三个十年中，开始兴奋前进，到前线，到农村，作宣传，作动员，甚至有的情愿抛弃手中的笔，拿起作战的枪刀。在抗日根据地中的情形则更气象万千。在农民中这三十年的变化和在小说中的反映也是同样的巨大、鲜明的，《故乡》中的闰土以及闰土的父亲是老一代的听天认命的在昏睡中的典型，《山雨》中的奚二叔也是同样的人物，但奚大有则是从昏睡到初步觉醒了，比他觉醒得更早更理解现实的是他的同乡邻居杜烈、杜英兄妹，他（她）俩已从农村走进工厂了，而且和革命组织有了一定的关系。象我们的战士就是穿上军装的农民一样，我们的工人绝大多数是放下镰刀拿起斧头的农民，中国工农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在第三个十年也就是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中，农民的牺牲，农民的贡献，是罄竹难书的，这种精神，这种品格，是泣天地、感鬼神的，我们以“伟大”来形容，他（她）们是当之无愧的！在凶恶的敌人“扫荡”“清查”的危急关头，为着保卫我们一个战士，会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丈夫或儿子以至自己的生命。这情形不是偶然有之，而是相当普遍的，军民这种血肉联系、休戚与共的关系，仅仅名之为“鱼水关系”是还不足的。这样的情形反映在我们抗战时期的小说中的例证是举不胜举的。

在国内出版现代小说史，可能这是第一部，小说史这样分章法也是一种尝试，这种分法有其方便的方面，自然也有其不方便的方面。例如，过去将现代文学史分为四或五个时期，以致不得不将一个作家的作品分割为几段叙述；现在这分法则出现了一个作家甚至一篇作品中的人物分别在不同篇章中论述。此外，有的人物形象可能具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身分，例如祥林嫂，她是一个妇女形象，她是从农村来的，很明显的，在到鲁家以前是个农妇，而到鲁家的工作是佣妇，应属于工人中的杂工一类。对于这类的情况，为了避免过多的重复，我们处理的方法是选择其在小说中主要塑造的形象是什么。关于祥林嫂，农妇的身分可以不加考虑，作为女佣固然着墨很多，但作品主要刻画的是她作为一个封建宗法社会中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残酷压榨下而惨死的，也就是被宗法社会“吃掉”的贫弱妇女形象。我们就将她放在妇女形象一章中论述。有的人物形象似乎在不同的篇章中都该收入，我们就采取了有详有略的方式。我们就是这样共分为八章，也就是主要的八种不同的人物形象。若是更详细分别的可能更多些，有的我们是将相近的合在一起了，象《风波》中的七斤，在小说中写的是以划船为业，我们暂时将他放在农民形象中了，类似这样的情况不只七斤一人。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少数形象，在学术界尚有不同的看法，象阿Q，究竟是一种什么形象呢？有种种不同的看法，过去将他作为农民形象的人较多些，但近年来不只一人提出他应当属城镇贫民，鲁迅从来没说过阿Q是农民或是浮浪性的农民，他只说过“阿Q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他未说他有农民的质朴。他说：“在上海，从洋车夫，小车夫里面，恐怕可以找出他的影子。若就小说的背

景未庄来说，咸亨酒店、土谷祠、当铺等等，足断它的原型是绍兴，绍兴是唐宋明清以来历代的名城，出过不少的历史名人，文物古迹遍布全市，实际并不是什么村庄，阿Q、王胡、小D等人，都是城市无恒业无恒产的贫民，他们都是靠临时打杂为生。农村中的雇工或短工，主要的工作是播种、收割、耕耘，在整篇小说中从未见阿Q做这类工作，只说过“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至于过去他是不是农民，既然连他的姓都不清楚，当然更无从考证了。我觉只凭这点难以确定他的农民成分。是我建议执笔者将他从农民形象中移到城市贫民中的，若是这样做是不妥的话，那责任应由我来负。

田仲济

1983年3月10日于泉城

第一章 反映着时代脉搏 的知识分子形象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是一个复杂的阶层。因他们的经济地位、政治态度和世界观不尽相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历史条件的变化，其经济地位和思想观点也不断发展变化。但知识分子阶层的主体始终是小资产阶级。他们是反帝反封建的重要力量，是五四运动的发难者，是在中国民主革命运动中首先觉悟的成份。他们的命运和道路反映着时代的脉搏、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同时，中国现代作家又大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此，知识分子的命运和道路便成为中国现代小说所着重描写的题材。

纵观三十年现代小说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到知识分子的形象已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它包括的形象虽然丰富多彩，但都深刻着时代的烙印。就其总体来看，第一个十年的知识分子形象都是置身于封建与反封建的新旧矛盾斗争中的人物，他们或者是封建制度及其文化道德的叛逆者、牺牲者，或者是封建制度及其文化道德的维护者；第二个十年的知识分子形象多是置身于大革命洪流中的人物，但也有游离于革命潮流外的分子，他们或者是革命时代的觉醒者，或者是徘徊于中路的彷徨者；第三个十年的知识分子则多是在民族危急、社会矛盾尖锐复杂的艰难岁月里争斗的人，艰难的环境铸炼和改造了他们的灵魂，他们是艰难岁月里的铸炼者。

一 封建制度的叛逆者、牺牲者和维护者

在新文学产生与发展的第一个十年里，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小说，与同时期其他题材的小说相比，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占着绝对优势。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鲁迅的《狂人日记》（1918年）、《一件小事》（1919年）、《孔乙己》（1919年）、《头发的故事》（1920年）、《白光》（1922年）、《端午节》（1922年）、《在酒楼上》（1924年）、《幸福的家庭》（1924年）、《肥皂》（1924年）、《高老夫子》（1925年）、《孤独者》（1925年）、《伤逝》（1925年）、《长明灯》（1925年）；郭沫若的《牧羊哀话》（1919年）、《残春》（1922年）、《月蚀》（1923年）、《喀尔美萝姑娘》（1925年）、《漂流三部曲》（1924年）、《行路难》（1925年）、《阳春别》（1925年）和《落叶》（1925年）；郁达夫的《沉沦》（1921年）；冰心的《斯人独憔悴》（1919年）、《两个家庭》（1919年）、《超人》（1921年）；庐隐的《海滨故人》（1923年）等。这些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都带有鲜明的启蒙时代的特色。他们多生活在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前后新旧矛盾斗争极其尖锐激烈的时代，大都是时代激流中的人物。他们或者是封建制度的叛逆者、牺牲者，或者是封建制度及其文化道德的维护者。他们尽管思想性格各异，代表的社会力量不同，但却都是那个新旧社会决战的大时代的产儿，他们的思想反映着时代的脉搏。

(一)

在第一个十年里，首先成功地塑造了知识分子形象的是鲁迅的小说。鲁迅的两个短篇小说集《呐喊》（1923年8月北京新潮社出版）和《彷徨》（1926年8月北京北新书局出版）共收短篇小说二十五篇，其中描写知识分子的十四篇。在这些小说中，作者以崭新的现实主义方法，从寻找中国革命力量和探求知识分子道路的角度，真实地写出自清末到五四后中国三代知识分子的灵魂和道路。第一代是清末的知识分子，如《狂人日记》中的狂人，《长明灯》中的疯子，《孔乙己》中的孔乙己和《白光》中的陈士成等；第二代是辛亥革命以后到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如《一件小事》中的“我”，《在酒楼上》中的吕维甫，《孤独者》中的魏连殳，《肥皂》中的四铭和《高老夫子》中的高尔础等；第三代是五四落潮以后的知识分子，可以《幸福的家庭》中的文学青年和《伤逝》中的涓生为代表。这三代知识分子就其同时代和政治的关系看，显然属于不同的三种类型：狂人、疯子、《一件小事》中的“我”、吕维甫、魏连殳、涓生和《幸福的家庭》中的文学青年等属于封建制度的叛逆者；孔乙己、陈士成等属于封建制度下的牺牲者；四铭和高尔础则属于封建制度及其文化的维护者。

《狂人日记》^①以独特的艺术手法塑造了中国现代小说中第一代知识分子的叛逆者形象。这个形象所具有的彻底的民主革命思想及叛逆者的性格，是通过狂人发狂的原因和他那似狂非狂的特殊心理及言行曲折地表现出来的。狂人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受过封建教育，目睹过家族制度和礼教吃人的事实

^① 1918年5月《新青年》4卷5号。

（“有给知县打过枷的”，“有给绅士掌过嘴的”，“有县衙占了他妻子的”，“有娘老子被债主逼死的”），身受封建传统思想和伦理道德的束缚、压迫和残害。他被迫害致狂的悲剧，反映了当时觉醒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他是封建家族制度的叛逆者，他的发狂正表现了他的觉醒和反抗。

狂人的突出心理特征是“恐惧”。他认为周围的人都想加害于自己，现实变成了“吃人”的世界，因此，对于四周的景象，自身的处境，都抱有极端恐惧的心情。他以恐惧的心理去观察、分析一切人和事，恐惧成为他意识的核心。但作者描写狂人的恐惧决不是自然主义地表现迫害狂患者的特殊心理状态，而是通过这恐惧写人物同环境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从而显示出觉醒的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同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的根本对立。

狂人的另一个心理特征是“敏感”和“多疑”。“敏感”使他洞察事物的微末，“多疑”使他常生联想和幻觉。这些也都是迫害狂患者特有的心理状态。但作者恰恰借它表现了觉醒的知识分子对家族制度和礼教以及整个封建社会的清醒而精辟的认识和彻底的民主革命思想。狂人半夜查看历史，见“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这是神经错乱时引起的幻觉，但却真实地写出当时觉醒的一代知识分子对于家族制度和礼教最本质的认识。“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是狂人从赵家的狗叫声所生的联想，可它深刻而准确地揭露了封建卫道者的阶级本性。“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和“救救孩子”的呼喊，也完全符合狂人敏感多疑的心理特征，然而，它又异常清晰地表现着觉醒的知识分子的民主革命的理想和对未来社会深刻的认识。

《狂人日记》写在一九一八年五月，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涨时期。当时的作者已是一个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其思想特征主要是彻底地否定旧的封建传统，希望在中国有彻底改革的觉醒者产生。如在一九一九年写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就直接表述了他上述的思想。他批判以前反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的不彻底性，认为一些“自称‘革命’的勃谿子弟，纯属旧式”，他们的所谓家庭“革命”，“其实也仍是讨嫖钱至于相骂，要赌本至于相打之类，与觉醒者的改革，截然两途”。他把彻底改革社会的希望寄托在两种人身上，这便是觉醒的“父母”和天真的孩子。他呼吁觉醒的父母，首先要“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作者这种彻底反对旧传统、寄希望于未来的民主革命思想，在《狂人日记》中，便都借狂人似狂非狂的语言和心理，得到了淋漓尽致地表现。于是，狂人便成为五四时代精神的号筒，在新文化运动中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当《狂人日记》在一九一八年《新青年》第四号上发表之后，吴虞便写了论文《吃人与礼教》在《新青年》第六号上发表。这篇文章从《狂人日记》读后感的角度，进一步发挥和以史料印证了《狂人日记》关于“礼教吃人”的思想。他说：“我读《新青年》里鲁迅君的《狂人日记》，不觉得发了许多感想。……我觉得他这日记，把吃人的内容和仁义道德的表面看的清清楚楚。那些戴着礼教假面具吃人的滑头伎俩，都被他把黑幕揭破了。”

当然，《狂人日记》的巨大影响和成功也是和作者在艺术创作中善于继承和借鉴分不开的。这个情况，作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曾有真切的说明。

《长明灯》^①的写作，后于《狂人日记》近七年，但所塑造的“疯子”的形象却与“狂人”很相似。这相似之处是两个形象都表现了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传统思想。不同之处是狂人反对和否定的是家族制度维护下的封建礼教，而“疯子”反对和否定的则是家族制度维护下的封建迷信；狂人的否定和反对重在“言”，而“疯子”则重在“行”。

作者以现实主义的白描手法真实地描绘了“疯子”所生活的典型环境——迷信守旧的吉光屯：“这屯上的居民是不大出行的，动一动就须查黄历，看那上面是否写着‘不宜出行’；倘没有写，出去也须先走喜神方，迎吉利。”这个屯所以叫“吉光屯”是因社庙里点着一盏从梁武帝点起，一直传下来的“琉璃灯”。他们都相信这长明灯主宰着全屯人的命运，灯一灭，屯就“要变海”，人“都要变泥鳅”。所以，他们都把这封建传统的象征——“长明灯”看成自己的命根子，拼命加以维护。在这迷信守旧的村民中，“疯子”是唯一敢于离经叛道的叛徒。他所以被众口指为“疯子”的理由，就是因为他是一个觉醒者，要把祖庙里象征封建传统的“长明灯”吹灭。

以“长明灯”象征几千年来被世俗认为“天经地义”的封建传统，通过“疯子”要吹灭“长明灯”的决绝行动，表现我国第一代觉醒的知识分子彻底地反对和否定封建主义传统的民主革命思想，便是作者写这篇小说的艺术构思。

《长明灯》创作于五四运动落潮以后。当时作者正处在孤独的彷徨时期。这个时代的特点反映在“疯子”的形象中，便形成它孤独和决绝的性格特征。

“疯子”是孤独的叛逆者。他反封建的思想和行为，虽然

^① 1925年3月北京《民国日报》。

代表着群众的利益，但却是群众所不理解的。这便是群众不仅不支持他“吹灭”“长明灯”，反而把他当作“疯子”，而任意加害的原因。这个孤独者的特点是第一代觉醒的知识分子共有的，如《药》中的夏瑜也表现了这样的孤独。

“疯子”决绝的性格特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韧性战斗精神：社庙里塑着的“三头六臂的蓝脸，三只眼睛，长帽，半个的头，牛头和猪牙齿”等凶神恶煞代表着封建社会的吃人者。“疯子”要消灭这些吃人者，但他知道单凭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反抗的第一步计划是先吹灭“长明灯”，虽然灯灭了这些凶煞“还在”，但在群众不觉醒的时候，“只能姑且这么办”。对于迷信守旧如吉光屯的村民者，用科学道理来说服，简直是不可能的，于是他便采用他们能接受的迷信的语言来说明利害（说吹熄长明灯，“就不会有蝗虫，不会有猪咀瘟”）。这种从实际可能出发，讲求斗争策略的作法，正表现了鲁迅所提倡的韧战精神。其二是坚毅不拔的斗争意志：他吹灭长明灯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阔亭们用“我替你吹”来欺骗，他回答：“不要你们，我自己去熄！”他们用“打断你的骨头”来威胁，他回答以利剑一样的目光，致“使阔亭的眼光赶紧辟易”；他们把他紧紧关在庙门之外笑问“看你有什么别的法”，他的回答是“我放火！”他们将他锁在社庙的西厢屋里准备绑送县衙，他的回答仍然是“我放火！”这种决绝的性格特征深刻地体现着鲁迅的战斗精神，使“疯子”的形象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在鲁迅笔下的第一代知识分子形象中，还有同上述形象相对照的另一类不觉悟的知识分子形象，这便是《孔乙己》^①中

^① 1919年4月《新青年》6卷4号。